

● 中国政治

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王 孔 祥

(武汉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孔祥(1973-)男,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理论课部讲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研究。

[摘 要]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是长期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解决“三农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尤其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三农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准备,解决“三农问题”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的大力协作。

[关键词] 三农问题;重要性;紧迫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1)06-0714-07

现代农业概念包括农、林、牧、渔、副等部门。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面积占国土的 90% 以上,人口占全国的 70%,农业年产值占国民经济总量的 17.3%,对国计民生有着巨大的意义。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1996 年粮食总产达 50453.5 万吨,是 1949 年 11320 万吨的 3.46 倍;粮食、棉花、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等总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广大农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由 1977 年的 2.6 亿下降为 1998 年的 4100 万;东部等发达地区的农民率先进入小康^[1](第 66-70 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成就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

但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依靠政府、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

一、“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民、农村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和根据地。新中国的成立,也是得到农民支持的东方式革命胜利的结果。“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解读。对此,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着重论述了农民对中国的重要性,他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2](第 1077-1078 页)中国共产党还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思想: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为其它产业提供原材料、劳动力,是工业品的主要销售市场,还能直接出口换取外汇,等等。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早在建国初,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农民,忘记农民,读 100 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在中国也没有用。”^[3](第 4-9 页)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进行工业化、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成功地配合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

* 收稿日期: 2001-03-21

发展的战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低廉的农产品和原始积累,支持了国家工业化。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则把农业提到“根本”的地位。邓小平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4](第 23 页)“我国 80% 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4](第 213 页)“翻两番,很重要的是这 80% 的人口能不能达到。”^[4](第 78 页)“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4](第 237 页)“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5](第 322 页)“农业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4](第 237 页)基于这些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的顺利进行积累了重要经验。……没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农村经济的繁荣,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全面展开,国民生产总值就不可能提前实现翻一番,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局面。”^[6](第 421 页)中国改革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使党在新时期的第二次创业取得丰硕成果。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同样重视“三农问题”,把它们提到关系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全局的高度。江泽民指出:从长远来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农业没有更大的发展,农村经济不能登上新台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

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这也说明“三农问题”的重要。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一个新阶段。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农业立法和执法,支持和保护农业;并指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稳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全局的主动权。

农业兴则国家兴,农村稳则国家稳,农民强则国家强,这是我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经验;相反,农业弱则国家弱,农村乱则国家乱,农民弱则国家弱,则是我国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教训。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导致中国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在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竞争中不堪一击,迅速崩溃,这又加深了农民的痛苦,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发起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极大地震撼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动摇了反动的上层建筑,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是以农业的恢复为基础,并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1952—1990 年,我国农业为工业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 1 万亿元的资金积累。从 1979—1984 年,农村消费和投资增长对 GDP 增长年贡献率达 45.5%^[7](第 7 页)。

可见,“三农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等处于攻坚阶段,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出现内需乏力、后劲不足等新问题;国际环境亦不容乐观,加之“入世”的逼近,我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经受着历史性的考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提醒我们更要关心、重视“三农问题”,切不可使之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于我国仅用占世界 7% 的耕地就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的吃饭问题,这种好大喜功的空气曾弥漫全国。殊不知,到 1998 年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 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43%,发达国家为 73%。^[8](第 4—16 页)我国是用占世界 40% 的农业劳动力来养活占世界 10% 的非农业人口。美国 90 年代初农业劳动者约 330—340 万人,1992 年产 3.5 亿吨谷物(不含大豆、薯类);我国 1992 年农业劳动者有 4.5 亿人,谷物产量约 4 亿吨。同期日本农户 334 万户,仅占全国总量的 7.2%,而我国则占近 70%。^[9](第 27 页)这不仅反映出我国农业生产率低下,也说明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经济还不发达。发达的国家必须有发达的农业,这是世界发展史证明的一个道理。

中国工业文明的车轮是通过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启动的。据有关学者测算,从 1952—1990 年,我国农业共为工业化提供净资金贡献为 9530 亿元。其中,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为 6990 亿元,占全部资金的 73.4%;通过政府农业税收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为 1850 亿元,占 19.4%;通过储蓄流入工业部门的资金为 1850 亿元,占 7.1%。^[10](第 213—218 页)农民对国家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国家又有多少回报呢? 1957 年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得到的收入人均均为 40.5 元,1977 年为 73.8 元,年均增加 1.66 元。^[11](第 13 页)工农业总产值之比由“五五”时的 30:70 变为“七五”时的 70:20,农业支出占同期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五五”时的 13.2% 降为“七五”的 8.2%,在国家预算的农轻重的投资分配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则由“五五”时的 10.5% 降为“七五”时的 3.3%^[11](第 13 页)。此外,作为我国社会的集体被剥夺者,农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享受不到多少医疗卫生、文教体育等福利保障。相反,我国城镇居民每年都可从国家那里获得可观的各种补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悲哀。

与此同时,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数据,1994年全国城乡家庭收入基尼系数达 0.445;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 2.57 倍,1994 年达 2.86 倍,1999 年为 2.65 倍。^[12](第 92 页)30%的城市居民控制着国民财富的 70%,70%的农村居民只控制国民财富的 30%。1990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86.3 元,1996 年达 1926.1 元,增加 2.81 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1387.3 元增长到 4337.0 元,增长 3.16 倍。^[13](第 205-212 页)1998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 2160 元,仅为城镇居民的 40%。农民收入的低水平增长直接导致农村消费的不足。从总体上看,农村消费水平要落后城镇 10-15 年。1997 年年底,我国城镇居民中每百户电冰箱、彩电、洗衣机、收录机、电扇的平均拥有量分别为 72.98 100.48 89.12 57.20 165.74,而农村仅 8.49 27.32 21.87 32.02 105.93 城镇居民“三大件”已更新三代,有的甚至在向第四代、第五代发展,而许多农村至今还停留在第二代、甚至第一代。

这就形成了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以农补工,劫贫济富,使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农村贫困的基础之上。这种主观上使农村依附于城市的发展模式客观上加重了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且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从理论上讲,有重点地发展城市经济的“城市产业倾斜”战略,可在短期内造成城市的繁荣和工业的快速发展,但许多发展中国的实践证明,这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的经济繁荣,实质上只是“泡沫”繁荣。从最终结果看,到农业无力支撑时,必然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大幅度年际波动、农村的进一步落后、城乡的进一步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我国自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萎缩这一原因而分别于 1958-1963 年、1969-1975 年、1985-1988 年、1992-1994 年落入困境,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临时支持农业的应急措施,而每次都以国民经济滑坡或市场物价高涨为代价。

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农业发展徘徊不前,农民负担沉重,农民增收越发困难。而据河南等地反映,现在农民负担名目繁多,仅大的项目就有乡村道路费、民兵训练费、优军抚属费、计生费、教育附加费、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罚款、乱集资、乱摊派,平均每户每年要上缴 900 元,远远超过国家规定只占上一年纯收入 5% 的标准;如果家里有孩子读书,年开支又将达数千元,更不用说碰上大病小灾再破费了。粮价则由于粮食过剩而持续走低:1997 年小麦保护价为 0.69 元/每斤,1996 年则为 0.51-0.53 元/每斤,1999 年上半年农民销粮平均价为 1.12 元/公斤,比 1998 年上半年下降 16.3%。^[14](第 40 页)此外,农药、化肥、种子、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成本过高,这样农民增收越发困难。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速明显放慢:1996 年比上年增长 9%,1997 降为 4.6%,1998 降为 4%,1999 年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再降为 3.8%。^[15](第 3-6 页)1997 年农民人均收入 2090 元,比 1996 年增长 4.6%,但增幅回落 4.4%;1998 年为 2160 元,比 1997 年增长 4.3%,增速回落 0.3%。^[16](第 45 页)1985-1996 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在 56.3-58.8% 之间徘徊,1996 年全国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程度仅 78.82%。而由于农民消费力的萎缩,国内市场出现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买方市场”。但这种过剩只适合于城市,在广大农村,农民的消费潜力仍是巨大的,只是被有限的消费能力束缚了。也正是由于农村的消费不足,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农业效益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农村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农民正逐渐失去农业生产积极性,很多人都弃田不耕而外出打工。据统计,农村现有劳动力 4.5 亿人,其中至少过剩 1.5 亿,2000 年农业剩余劳动力达到 2 个亿^[17](第 221-224 页)。近年来,这些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出现规模巨大的民工潮,全国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都在 7000 万以上。民工的来到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外出打工能缓解农村就业压力,解决农民脱贫致富问题;现代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总是先被城里人接受后传到农村。然而,其消极面也不容忽视:对城市的环境卫生、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和就业等带来巨大压力;对农村,虽然外出民工返回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往往不是用于生产投资,而是用于生活消费,首先是建房,甚至搞封建迷信。且外出民工多为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如湖南有的村剩下的人平均年龄 55 岁,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更加降低,大量农田抛荒,农业生产浪费严重,我国耕地却以每年 400-600 万亩的速度递减。

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关系密切。现在农村社会稳定形势出现新特点:1 干群矛盾和冲突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焦点。近年来,大规模农民集体越级上访事件明显增多,暴露出农村存在大量问题。一般说来,农民认为县和乡镇级政府是他们合法权益的侵害者,于是他们往往采取越级上访的形式到省市甚至中央去寻求保护。2 农村不稳定事件趋向群体化。近几年,湖南发生几起冲击县市政府的暴力事件^[18](第 70 页);3 农村恶性团伙组织兴起。1998 年,江西省查获 2360 个团伙组织,成员 8993 人,去年一季度查获团伙组织 486 个,成员 1852 人,其中 70% 在农村。^[19](第 45 页)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有:1 农民收入相对下降,而负担加重是影响农村稳定的经济根源;2 基层组织和干部的管理、控制能力削弱是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3 宗族、非法宗教势力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农村的非法组织,近年来查处的“法轮功”等五大邪教,在农村都有相当影响。

总之,当前“三农”问题不容乐观,甚至可说形势相当严峻。农业基础不稳,结构升级缓慢,生产力水平低,综合生产能力不高;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总投资比重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流通渠道不畅,农民进入市

场难;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农业长期缺乏科技积累,农业内部结构升级缓慢;农民负担过重,农业生产徘徊,干群关系紧张。而农民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低下,出路不明,更是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的不稳定因素。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如果农村问题没解决,中国的改革就不能算成功。从国家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迎接即将到来的“入世”挑战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以及最根本地——从保护农民利益的现实着眼,都需要我们充分重视“三农问题”,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以保证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伟大复兴这一崇高理想的实现。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可行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是解放劳动人民,即靠科学技术把劳动人民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靠政治、法律等把劳动人民从社会的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这是辩证统一的两方面。在当前形势下,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现实可行性。具体而言,要落实以下八个方面。

1. 解决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公有制是我国的经济基础,而土地国有更是公有制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农村,应做到耕者有其田,既杜绝土地私有制,又防止出现土地依附上的剥削行为和农民的内部分化。农业部可成为土地生产资料的独立法人,对国家和农民负责。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为全民所有,既不是政府所有,也不是农民私有。在此基础上实行土地租赁制,因为在土地租赁制下最容易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户三者之间在土地收益分配上的关系,也容易将这种关系规范化、制度化,从而根本解决农民负担问题。^[20](第 13—23 页)

2. 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和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就是按照产业组织发展经济,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打破封闭的农业发展格局和管理体制,建立新的市场农业管理体制和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它是生产目的的商品性、生产规模的集中性、生产手段的集约性、生产过程的专业性、经营方式的社会性的统一;遵循资源优势原则、市场需求原则、效益原则、规模化原则、产品优势原则、生态原则。^[21](第 44—49 页)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是增强农业自我发展能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学化程度的有效途径。^[22](第 42—51 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由 1978 年的不足 22% 提高到 1996 年的近 70%^[23](第 4—8 页),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发展面向市场的经济型规模农业,如花卉、水果、药材、珍禽异兽养殖等特色农业,为农民增收、提高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准备条件;提高粮棉油等重要作物种植的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其附加值,发达国家初级农产品与加工产品的消费比重达 2.8,而我国不到 0.8;要高度重视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保鲜、加工、储藏、运销和批发等在内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要树立农产品品牌意识,增强名牌、优质农产品管理,建设优质名牌农产品示范园区,加快名牌、优质农产品科技开发,鼓励具有名牌产品的优势企业跨部门、跨地区联合成立企业集团,积极招商引资,合作开发名牌、优质农产品;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如旅游、信息服务等,建立一套为农民提供信息及科技服务的机制,这既可解决农村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村、农业发展。

3. 加快农村、农业现代化进程。应提倡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即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要以现代文明取代落后愚昧,使农村有现代化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有高效率、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农村人地规模适度。应发挥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合理、有序地引导农民向西部迁移,政府鼓励垦荒、植树种草和采矿,并给予相应的补贴、优惠、扶持,以推动西部大开发。

农业发展应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为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准备条件。农业现代化在解放初是指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和化学化,1979 年后改为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国家通过实施“丰收计划”、“星火计划”、“燎原计划”,基本改变农业生产几千年不讲科学也种田的局面。1997 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比 1978 年增加 1/3,其中科技的贡献率达到 42%,主要技术是良种、化肥、农药和灌溉。西安杨陵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在加快新优品种培育、引进上做出很大贡献,陕单、户单玉米,秦油二号、杂 87 杂 59 油菜推广 18 省,占全国 80%;湖南袁隆平的米籼型杂交水稻 1979—1998 年全国累计推广 30 亿亩,增产稻谷 2 亿吨;安徽何家庆被誉为“中国魔芋大王”,他们对我国的农业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就国际比较而言,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仍很低,农户平均每百户有大中型拖拉机 0.53 台,仅为日本的 0.7%;平均每百户有小型拖拉机 6.1 台,仅为日本的 9%;平均每百户有联合收割机 0.06 台,仅为日本的 0.20%。这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4. 解决农民增收减负问题。正如江泽民强调的:“减轻还是加重农民负担,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保护还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是促进还是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增强还是丧失农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问题。必须把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提到这样的政治高度来认识,提到我们党的宗旨和农村政权稳定的高度来认识。”^[10](第 213—

218页)必须坚决打击欺压农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酷吏,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国家在进行开发式扶贫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产品价格,减少工农剪刀差,提高农民福利。

5. 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据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显示:我国农村住户从业人口中,文盲或半文盲占 14.0%,小学文化程度占 42.1%,初中文化程度占 38.0%,高中文化程度占 5.1%,中专文化程度占 0.6%,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 0.2%。其中文盲半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占 94.2%。^[24](第 40—47页)许多偏远乡村至今还没普及义务教育,相对于有些已普及高等教育的城市而言,这不能不说是太落后了。由于没有职业竞争,劳动力知识需求极低,农民提高自身素质的愿望不强烈,许多家庭不愿过多支付投资于下一代,致使人口素质提高缓慢。要转变劳动力是包袱的观念,大力发展农村、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种田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价值。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办法还有: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农民就近进城,在我国西部建设新城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等途径。2005—2010年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黄金时期,每年城市化率提高 1%,即意味着可多吸纳 100万农村劳动力。^[8](第 4—16页)此外,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1997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全国为 26.4%,农村仅 14.8%;第三产业占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全国为 32.1%,农村仅 12.4%。可见,农村第三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 开发农村大市场。农民结余购买力尚有 1.15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消费群体。农村住房是个很大的市场,预计全国农村市场的建筑材料消费额在 1000亿元以上。但目前国内许多县及县以下工业品市场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市场网络体系残缺不全,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生活用品品种单一,式样陈旧,质次价高,引不起农民购买兴趣。小型农机具配套程度较差,大型农机具租赁市场发育迟缓,农资专营市场管理规范化程度相对较差,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坑农事件时有发生。农民急盼工业品下乡建市场,希望城里大商场在农村建市场,希望工商企业在农村建立配套的售后服务网络。影响农民购买力的还有一个消费环境制约问题,这主要是一些农村缺水、缺电,电视接收转播效果差,道路、交通不尽如人意等,限制了一些消费品的购买使用,影响了农村市场的开发。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大市场的重要部分。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运输、农用设备、场地设施、仓储条件等,对农村产业结构亦有很大的影响。农村交通、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长期以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农民负担,是产生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中西部地区因经济实力弱,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的能力也较差,但这些地区恰好是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最重的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抓住当前国家财政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机遇,进一步扩大以工代赈、以粮代赈的规模。^[25](第 6—12页)国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刺激消费需求,解决城市市场过剩问题。同时,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支持力度,如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等重大工程;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修旱涝保收基本农田,开发小流域治理,加快荒山绿化,加强农村交通建设等。

7. 加强农村基层管理。首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变干部了解本村却不研究本村、不研究本地资源优势、不会抓住机遇、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的状况,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提高村干部政策水平和法制观念;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村民自治;认真研究、妥善处理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以及这些组织与乡镇党委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尽快彻底精简乡镇机构,削减干部,严惩腐败;发展集体经济,完善村民自治,推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理顺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管理体制,加强农村立法工作;进一步理顺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改变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不规范、不等价交换,农民承担义务随意性太大的局面。

8. 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农民是弱势群体,在旧社会,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而今照样处于社会最底层。要努力提高农民觉悟,加强对农民权利义务教育;要根本改变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向来是“热在上层,空在基层,冷在农民”的状况;要学习湖北宜昌的“四进家”活动,即理论进农家明,科技进农家富,文化进农家乐,法律进农家安;要大力举办农民学校,提高农民素质;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抓好农村电网、广播电视改建、交通通讯建设和邮政通信建设,把“两个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要让农村干部和群众真正感受到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切身利益。还要看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对提高农民素质、稳定农村治安和保证国家的政策法律信息迅速有效地传达到农民那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前,国家的经济困难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供给过剩、就业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依靠启动农村大市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城乡结合、工农结合的重大现实意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来大力缩小城乡、工农差别。除继续现在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以外,还可考虑实行城乡人员交流。当年“文化大革命”时期 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衷之一便是支援农村、改造农民,但由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限制,取得的成绩不大。而今非昔比,我国的经济、技术实力都有了长足进展,如果国家对农村、农业投资 1000亿、甚至只需几百亿,如果再有 1700万、甚至只需几百万有志、有识之士

奔赴广阔的农村天地,那么不出十年,我国的农业、农村面貌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将成倍增长,我国的国计民生也将根本改善。

我们要吸取农村改革中途而废,没有在战略和政策导向上将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没有将公有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国企改革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机会成本过大的教训,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农村、农业和农民;要下决心取消户籍制度,建立公平的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流通体制,消除城乡藩篱;改革城市偏向的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收入、就业、教育、保险、保障等体制,建立公平的城乡宏观政策环境。同时,既要深刻认识“三农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深刻认识农村市场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又要深刻认识增加农业投入、农民增收的重要性、紧迫性,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公民化、产品市场化、服务社会化。

四、希望寄托在政府、社会和农民身上

2001年 1月 5日,温家宝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是:1 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畜牧业发展,发展农产品加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要坚持面向市场、因地制宜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原则;政府要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扶持农村产业化经营,加快小城镇建设;2 在结构调整中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忽视农业,最重要的是不能忽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最关键的是不能忽视粮食生产;3 新阶段要始终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突出位置;4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切实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农村科技,繁荣农村文化,继续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培养和造就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农民。^[26](第3—13页)

总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依靠政府。因为,政府对此事负有责任,也有着社会和民众不可替代的力量。从理论上说,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增长速度适当快于农业增长速度是必要的,但在工业有了一定基础并有能力进行自身积累后,就应实行“反哺”政策,减弱国家对农业剩余索取的程度,在国家与农民的利益结构关系调节上倾向于农民,把农民创造的价值更多地留在农村,给农业造成较浓厚的发展积累;否则,会因失去农业的支撑导致工农业发展的失衡。现在的问题不是再怎样进行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而是如何实现这些政策、制度的本来目的,使农民真正从中受益。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为农民和农业提供法制服务、培育农村市场、加强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价格和福利等渠道对农民进行国家补偿上。随着“入世”的临近,政府还需对农业提供相应的保护,因为农产品问题的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我国农民人数众多、经济容量狭小和抵御风险能力很弱;而日本、欧盟的农产品价格均比国际价格高出很多,其政府都进行了较高的农业保护。

解决“三农问题”还需社会通力合作。要加大对“三农问题”的宣传力度,重提工农联盟、城乡结合、支援农村等口号,以唤起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心、重视;通过广泛多样的途径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海外资金,来支援农业、农村开发,国家对此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扶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产业,开发农业的产前、产后工业,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而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农村的人才瓶颈问题,要鼓励各类人才献身农村,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建功立业。

解决“三农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农民自身。农民身上蕴含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在中国大地上立下了不朽的丰碑,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农民的历史作用将再次得到体现。要培养、扶持一代又一代的乡村精英,带领农民共同富裕;广大农民要抓住机遇,利用好国家的政策,瞄准市场,脚踏实地,边干边学;要不等不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自觉跟上时代潮流,坚决摒弃小农意识,防止小富即安,富不思进;要顾全大局,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

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社会和农民身上,就是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共同努力,各尽其长,互帮互助,形成合力。政府宏观统筹规划,社会中坚积极响应,农民微观具体操作,利益共享,患难与共,群策群力,共同进步。

如果说城市是中国改革的主战场,那么农村就是中国改革的决战战场。“三农问题”既是中国的问题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未来的发展程度,直接取决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程度。解决“三农问题”,刻不容缓,也大有作为。

参 考 文 献

- [1] 韩永文. 我国农业在国家工业化建设进程中的贡献分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 (2).
-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 苗福生, 刘学文. 走进中国三个村[J]. 决策咨询, 1999, (12).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6] 江泽民. 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A].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7] 丁 力. 抓农民增收应从减负开始 [J]. 改革, 1995, (10).
- [8] 农业部课题组. 21 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0, (5).
- [9] 方 平. 对农民增收问题的认识 [J]. 决策咨询, 1999, (9).
- [10] 李晓凯, 常 超. 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与中国社会政治稳定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5).
- [11] 邹 新. 农村市场, 怎一个“启动”了得 [J]. 改革, 2000, (3).
- [12] 王学力. 个人收入差距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J]. 改革, 2000, (6).
- [13] 董俊山. 首先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5).
- [14] 耿 君, 胡为平. 当前农民收入状况分析 [J]. 决策咨询, 2000, (5).
- [15] 柳随年. 对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形势与任务的思考 [J]. 宏观经济研究, 2000, (6).
- [16] 夏大明. 农民为何增收慢 [J]. 中国国情国力, 1999, (10).
- [17] 刘 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 [J]. 学术界, 2000, (3).
- [18] 于建嵘. 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接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J]. 中国农村观察, 2000, (4).
- [19] 维护农村稳定要多为农民着想 [J]. 中国国情国力, 2000, (2).
- [20] 李 文.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和前瞻——写在改革开放 20 周年之际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2).
- [21] 董雅珍.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6).
- [22] 邱恩义. 新世纪农业概念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5).
- [23] 王忠海. 农村改革的经验与农村发展的新阶段——纪念中国农村改革 20 周年理论研讨会纪要 [J]. 中国农村经济, 1999, (4).
- [24] 于德运. 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嬗变与合理调整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4).
- [25] 胡书东. 政府职能界定与农村改革和发展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9, (2).
- [26] 温家宝. 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J]. 求是, 2000, (4).

(责任编辑 叶娟丽)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Peasant Today & Tomorrow

WANG Kong-xiang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Kong-xiang (1973-), male, Lecturer, School of Politics &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a's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bstract The question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peasant are not only very important to China, but also difficult ones disturbing China for a long time. And these questions solving has great realistic meaning and fardeep historic meaning. China's developmen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these questions' being solution. At the turn of centuries, concerning departments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questions because they are especially imminent to China today. Based on the preparation of 20 years' reform and open to world, the conditions are available for these questions' solution. To solven these questions thoroughly needs full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society and peasants themselves.

Key words the questions of agriculture, rural area and peasant; importance; imminence; availability